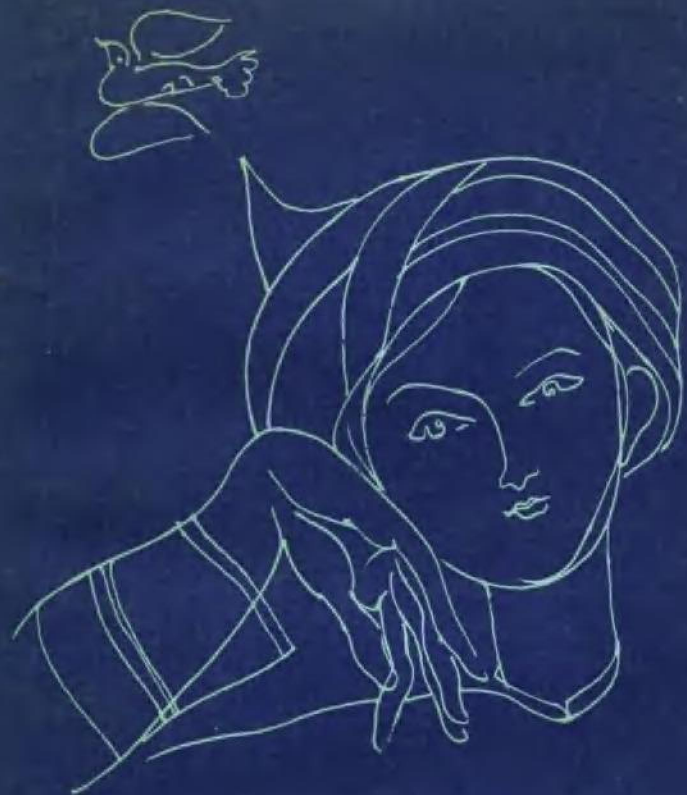




阿诗玛

撒尼民间叙事长诗

27
7-4

重 版 说 明

《阿诗玛》由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黄铁、杨智勇、刘绮、公刘整理，我社于一九五四年出版。此次重印，系第二次整理本。

封面、插图：袁 运 生

责任编辑：黄 伊

阿 诗 玛

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

黄铁 杨智勇 刘绮 公刘整理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960 1/32 4.5印张 50千字

195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2版

1980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5,001—25,000册 定价0.31元

《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

黄 铁、杨智勇、刘 绮、公 刘

(杨智勇执笔)

《阿诗玛》是彝族支系撒尼人民口头流传的长篇叙事诗。

这部长诗歌颂了劳动、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体现了撒尼人民反抗强暴、追求自由幸福的坚强意志,塑造了两个不向封建统治阶级低头的撒尼人民的代表人物——聪明、美丽、勤劳、坚强的阿诗玛和她的机智勇敢的哥哥阿黑。为了反抗热布巴拉对阿诗玛的婚姻掠夺,反抗热布巴拉家的残暴专横,兄妹俩作了一场坚贞不屈而又颇富机智的斗争。在封建势力还相当强大的历史条件下,阿诗玛兄妹的斗争只能以悲剧结束。阿诗玛牺牲了,但她的精神不死,她的形象永存,她化为撒尼人民生活中最亲切的回声,永远在撒尼人民

聚居的山峦重叠的圭山地区回响，在人民心中激荡。

《阿诗玛》的整理本，自 1954 年发表，并于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来，各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评论，除个别人的文章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肯定的前提下指出不足之处，这些批评是非常宝贵的，对我们帮助很大。在 1954 年发表整理本时，我们就曾这样说过：“我们这次仅只是初次尝试，作为一个文学胚胎向喜爱民间文艺的同志们提供资料，也作为向那些还不甚了解我国民族艺术遗产的同志们尽一些宣传的责任，但由于我们对于如何发掘、搜集、整理民间艺术遗产的工作还无经验，也由于本身修养不够，尤其是对兄弟民族的艺术传统理解甚少，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缺点甚至错误，希望同志们给以批评帮助。”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阿诗玛》的序言中也说：“《阿诗玛》的这个整理本是成功的，自然还不是完美无缺的，希望将来还能有所加工。”

在粉碎“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积极努力的今天，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

二十五年前的这个整理本再作一次整理，已成为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现在送到读者面前的就是经过我们第二次整理的本子。

在这篇序言里，我们准备谈谈搜集经过，整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做法；第二次整理的改动部分及改动的依据。现在，我们再一次提及原整理本的搜集、整理经过，是基于下述原因：

(一)二十多年来，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的成绩显著，但对民间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却显得比较薄弱。究应如何搜集，意见比较统一，至于怎样整理才是正确的，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分歧很大，如有的用学院式的考证来衡量某部整理本的得失，有的又主张具体作品应当具体分析；有的主张宁可抱残守缺，有的主张不如改旧编新；有的主张只应由本民族的人整理，有的主张在积极帮助本民族文艺工作者整理的同时，汉族文艺工作者可以与本民族文艺工作者合作整理或者单独整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一部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而且还增加了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料和依据。《阿诗玛》发表以后，曾受到国内外关心民族民间文学人士的重视，评论者之间看法也不一，因

此,把我们走过的路,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介绍出来,对于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的探讨和研究,相信是会有好处的。

(二)原整理本发表后,整理者虽然发表过一些介绍整理经过的文章,但都比较零星,缺乏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有的则只是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整理者全体。由于工作调动及其他原因,我们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对于原来的整理工作作一次全面的回顾,现在,终于得到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所以,比较系统地谈谈搜集整理经过是必要的,这有助于关心这一工作的同志对整理经过及指导思想的了解,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有益的帮助。

一 搜集经过

1950年9月,《诗歌与散文》发表了杨放同志记录翻译的阿诗玛曲谱和部分歌词,其内容虽然只限于控诉公婆虐待媳妇的痛苦,但那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却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1953年初,云南军区京剧团作了将阿诗玛故事改编为京剧的尝试,更引起有关领导同志对这一传说的重视。黄铁同志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根

据她的倡议，省文工团组织了工作组到圭山区进行搜集。工作组成员有刘绮、杨放、马绍云、徐守廉、杨瑞冰、杨戈、朱虹、杨素华、陈士雄、杨智勇等同志。原来打算改为歌剧，所以工作组成员有文学、音乐、舞蹈等方面的人员，杨放同志当时并不在省文工团工作，因他比较熟悉撒尼族音乐，所以也吸收参加工作组。

居住在云南圭山区的撒尼人民，有着光辉的斗争历史。据本民族的传说，他们在若干年前，原住滇西大理一带，后移居昆明碧鸡关。因为反抗租佃压迫失败，才被迫再度迁徙到圭山区。早在1945年以前，中共云南地下党就在圭山区进行培养干部的工作。云南的游击战争就是在圭山区打响第一枪的。在血与火的锻炼中，撒尼人民涌现了大批有革命觉悟的先进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毕恒光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样的民族产生《阿诗玛》是很自然的。

工作组在路南县委的帮助下，选择了撒尼特色保持较浓的额匀衣村做基地，同时根据掌握的线索，到附近村寨搜集材料。

工作组的同志刚刚参加过两批土地改革的斗

争,绝大部分同志又来自滇桂黔边区纵队,曾经长期战斗在少数民族地区,个别同志 1945 年就曾在圭山区工作过,对撒尼人民有较深的感情。由于保持了游击队员和土改工作队的传统,关心群众,坚持三同,所以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比较深的感情。有的撒尼群众还把他们婚姻的不幸向我们诉说;生活上有了困难,也来要求我们帮助解决。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彼此流泪惜别。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短短两个半月时间,撒尼人民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阿诗玛》的二十份不同传说,三百来首民歌和许多民间故事。

假如我们抱着单纯猎取材料的态度去收集《阿诗玛》的传说,那就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更不可能带着深厚的感情投入整理工作,并象撒尼人民那样热爱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阿诗玛和阿黑。

对于传说的搜集,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方针:尽可能做到全面搜集。我们所说的全面,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争取将《阿诗玛》的传说尽可能全面搜集,不管其内容是否健康,主题思想是否矛盾,故事情节是否出入较大,凡是能搜集到的都要搜集起来。我们体会到,只有这样,才可能了解其

流传情况及变异过程,才可能进行全面研究,辨别出哪是珍珠,哪是鱼目,才可能克服我们的主观圈子。其次,凡是与《阿诗玛》传说有关联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情况,宗教信仰、婚姻制度、风俗习惯,《阿诗玛》与群众的关系以及其他民间传说、山歌、民谣、音乐舞蹈等等,要尽可能地搜集起来。因为任何一个民间传说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与上述各方面发生密切联系,离开了这些,就无法理解《阿诗玛》当中的一些问题,无法理解它何以会这样被撒尼人民所热爱。

在搜集工作中,可惜我们过多地偏重于《阿诗玛》的传说本身,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做得不够深,不够细,给整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对有关岩神的情况就了解不够,以致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捉摸不定甚至某种混乱现象。

在语言方面,最大的困难是工作组成员中没有一个懂得撒尼语。替我们翻译的主要人员是当地的两个小学教师,开始还出现过用现代化语言代替撒尼人习惯用语的情况,如把“笑声象知了”译成“笑声象留声机”,把“滚得象团麻”译成“滚得象皮球”,在我们反复说明保持本民族语言特色的重要意义以后,译文才接近准确;但仍然存在一些

不准确的地方，如译文中还保存着“民族街子”、“什么委员都不嫁”这样的用语。

二 整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做法

最初的整理工作由黄铁、杨智勇、刘绮承担，初稿完成以后，当时在昆明部队工作的公刘也奉命参加了进来。

民族民间文学是各族劳动人民的文学创作。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人民性；它的外部特征是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匿名性和传统性。《阿诗玛》这部长诗的变异性非常突出，即便和二十多年来发掘的其他民族的长篇叙事诗相比，它的变异性也是比较突出的，不管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甚至完全对立。如何保持这部长诗的民族特色（包括语言、艺术传统和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真实），如何使人民真正的思想得到出色的艺术再现；对于毫无整理经验的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是在摸索中前进的。毫不讳言，我们当时对于“整理”这个概念都还比较模糊，这从在报刊上发表的用语就充分反映出来，第一次打印本是“改写”，在

《人民文学》发表时用的是“编译”，经有关同志反复讨论之后，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单行本时才确定为“整理”。

尽管我们毫无经验，但我们并没有在整理《阿诗玛》这一困难、复杂的事物面前畏缩不前，毛主席的教导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是我们当时整理工作中唯一的指导思想。

（一）用综合的方法进行整理

在动手进行整理之前，我们先根据二十份异文和有关材料就下述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一、故事的演变过程（包括时代背景）；二、故事的主题思想；三、人物形象；四、传说特点；五、哪些是人民性部分，哪些是封建性部分；六、语言、表现方法、结构、风格；七、如何使整理工作做到既不违反撒尼人民的愿望，离开其文学传统和生活真实，而以我们的偏好去取而代之，又能做到使撒尼人民真正的思想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得到

出色的艺术再现。对上述问题进行反复讨论逐项明确之后,即将二十份异文全部打散、拆开,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归纳,剔除其不健康的部分,集中其精华部分,再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等的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足。

这种综合式的整理方法,是根据《阿诗玛》原始材料的特点形成的,因为二十份异文中的任何一篇都不可能作为比较完美的艺术品原封不动地介绍给读者,甚至不可能以某一篇作为整理的基础,再吸收其他几份材料补足加工。可以说,精华和糟粕都散存于二十份异文中,需要经过分析提炼之后,才能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再经过加工之后才能构成一篇比较完整的艺术品。

(二)《阿诗玛》的时代背景

从原始材料中可以看出,《阿诗玛》形成比较完整的民间文学,是在阶级社会形成以后。它究竟是形成于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由于撒尼人民缺乏文字记录,我们也不是历史学者,在当时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只能就作品本身反映的一些材料以及解放前撒尼人的社会情况作

些粗浅的判断。

彝族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撒尼是彝族的一个支系,它的历史发展虽较晚于汉族,但从他们因为反抗租佃剥削失败而从昆明碧鸡关迁移到圭山区的传说中可以看出,远在迁移到圭山以前,大约在公元前二、三世纪,他们祖先居住的安宁河和滇池二个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圭山区是内地山区,迁到圭山区以后产生的阶级分化,不可能回复到在碧鸡关居住以前的历史阶段。这从热布巴拉还需要请海热做媒人,说婚不成就采取掠夺的做法,以及原诗中有“自己家无山无树,巴拉家有山有树”,“卖工讨生活,哪里有大田,卖工去哪里”,“放牛的老帮工”等诗句,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特征。在土地改革以前,撒尼人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传说本身也反映出热布巴拉是拥有大量土地财富、与官府密切勾结、又有神权依恃的横行于一个地区的恶霸,群众仇恨热布巴拉,正表示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根据这些,我们确定《阿诗玛》的时代背景是封建社会。

(三)《阿诗玛》的主题思想

民间文学在口头流传过程中,往往出现遗漏、

增补、删节以及改变内容的情况。内容的改变,有的来自统治阶级和宗教职业者的有意篡改,有的则来自人民群众,他们把自己的不幸和痛苦,愿望和理想融进民间文学中,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统治阶级的篡改,多半是有害的不健康的。来自人民群众的变异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健康的,一种是不健康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马克思)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难免含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这就是民间文学中精华和糟粕并存的重要原因,也是同一母题的民间文学会有几个不同主题的原因。这种情况,在《阿诗玛》的原始材料中反映的特别突出。在二十份异文中就有这样几种主题思想:一、控诉被公婆和丈夫虐待的痛苦;二、反抗统治阶级的婚姻掠夺,追求幸福自由;三、维护传统习俗;四、显示女方亲人的威力,使公婆丈夫不敢虐待;五、羡慕热布巴拉家的富有,阿诗玛安心地在他家生活(如第四号材料中阿黑对阿诗玛说:“自己家无山无树,热布巴拉家有山有树,可以安定下来”);六、阿诗玛变成抽牌神,群众耳鸣是因阿诗玛作怪,责备她死后不应该变成恶神。别林斯基把民间创作看作人民的世界观的体现,他说:

“人民性已经成为一切诗歌作品及诗的荣誉的试金石和最高的准绳”。《阿诗玛》这部民间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在哪里？撒尼人民通过它表现的世界观是什么？也就是说：整理者应该怎样根据原始材料反映的不同观点来确定它的主题思想？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整理一部民间文学，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差异很大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中分析出哪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人民的世界观，表达了该族人民的爱和憎，并据此确定它的主题思想，绝不能按原始材料的比例数字或单纯依靠学院式的考证来确定主题思想。经过反复的分析研究，以及和撒尼群众共同探讨，我们认识到，撒尼人民对于“种着山地住着房”的格路日明夫妇（阿诗玛父母）洋溢着本阶级的自豪和赞赏：

格路日明家，
花开蜜蜂来，
嗡嗡地叫嚷，
忙着把蜜采。

对于“金银马蹄大，牛羊遍九山”的敌对阶级代表人物热布巴拉则充满鄙弃和仇恨：

热布巴拉家，
有势有钱财，
就是花开蜂不来，
就是有蜜蜂不采。

撒尼人民之所以热爱阿诗玛和阿黑，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撒尼劳动人民的愿望和意志，体现了撒尼劳动人民的崇高品德；之所以仇恨热布巴拉父子和那个充当帮凶的“普天下的官”——海热，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是抢来的不义之财，是因为他们依仗权势，依赖神权迫害阿诗玛；而这一切，和撒尼人民的政治经济情况是密切联系着的。尽管反映这一主题思想的材料，在原始材料中占的比例不大，但我们从中看到它的巨大的思想意义，看到它灼人的光辉，看到撒尼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所以，我们排除了其他主题思想，把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婚姻掠夺和争取自由幸福作为这一作品的主题思想。

（四）人物关系的确定

在人物关系上碰到的问题，主要是阿诗玛和阿黑是兄妹关系还是爱人关系。

工作组下去调查的时候，有的同志希望他们是爱人关系。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在改编为歌剧时，剧情容易展开，抒情成分可以更浓厚一些。但从所有的传说中都找不到爱人关系的根据。也问过许多撒尼人，他们都一致否认了爱人关系。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按照传说的材料和撒尼人民的意见用兄妹关系整理，还是利用所谓的史学考证或捕风捉影的“想当然”来适应自己的愿望，定为爱人关系？

在讨论第一次整理稿的座谈会上，有的领导同志提出：“虽然阿黑和阿诗玛是兄妹关系，但也贯穿了爱情在里面。”有的同志说：“怎么搞研究工作呢？如兄妹关系和爱人关系的问题，现在就不能解决。原始的民族，兄妹是否可以结婚，我现在还在怀疑。”其他对这个问题保留自己看法的也大有人在，如把阿黑与阿诗玛用笛子和口弦对话作为爱人关系的依据（因为按撒尼人的习惯，兄妹之间不允许这样对话，只有爱人之间才允许这样对话）。

这是涉及到是否忠实于原作，是否尊重民族习惯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我们考虑了这样几点：一、二十份传说中没有一份肯定他们是爱人关